

古代的中印關係

黃大受

一、中印兩國歷史上的交往

中國與印度，同屬亞洲的兩個大國。自列寧訂定：「由莫斯科至巴黎，是經由北平、加爾各答的路線最近」的策略後，中印兩國便同時成爲國際共黨赤化的目標。

中國與印度交往，已有二千年以上的歷史，見諸記載的始於漢書地理志。

漢書卷二八下粵地條後云：「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，船行可五月，有都元國，又船行可四月，有呂盧沒國，又船行可二十餘日，有諶離國，步行可十餘日，有夫甘都盧國，船行可二月餘，有黃支國，民俗略與珠崖相類，其州廣大，戶口多，多異物，自武帝（西元前一四〇—前八七年）以來，皆獻見。有譯長屬黃門，與應募者俱入海，市明珠，璧流離，奇石，異物，齎黃金雜綸而往，所至國皆粟食爲糧，蠻夷賣船，轉送致之，亦利交易，剽殺人，又若逢風被溺死，不者數年來還，大珠至圍二十寸以下。平帝元始（一一五年）中，王莽輔政，欲耀威德，厚遣黃支王，令遣使獻生犀牛。由黃支船行，可八月到皮宗，船行可二月，到日南象林界云。黃支之南有己程不國，漢之譯使，自此還矣！」

徐聞合浦在現今的雷州半島，是當時遠洋航行的起點。黃門隸屬少府。漢代下南洋的人，也可能是宦官之流。其中所經過各國，雖然都在南洋，但各國究爲現今何地，學者並無定論。不過據馮承鈞中國南洋交通史上篇第一章所述，藤田豐八和費瑯(G. Ferard)，都認爲黃支國即大唐西域記卷十的達羅毘荼國城建志補羅。(Kandibud, 即今 Conjevoram, 在 Madras 的西南。)而西元前在南印度的拔羅婆(Pallava)朝，曾建都於建志補羅，文化發達。紀元前一

二百年，中國漢朝皇帝使者所到的黃支國，即是拔羅婆朝的國都，可見中國與南印度的接觸，已有二千年以上的歷史。從此以後，中國每一個朝代，幾乎都有人到南洋去，而南印度東岸海中的錫蘭島，更是中國人常到的地方。

在中國唐太宗時（西元六二七—六四九年），一位名叫玄奘的和尚，在西元六二七年啓程，從陸路經過中亞細亞而到印度，留學研究佛經，得到了極大的成就。到西元六四三年，方動身回中國，在印度十五年中，遍遊印度各國。到過南印度的十多國，而且留下了一部遊記。

西元一二〇六年回教國，回教國在德里建立。西元三三九八年，帖木兒的蒙古大軍進入印度。

西元一五二六年，帖木兒的五世孫又入印度統治印度北部，建立蒙古帝國。至西元一七〇七年開始衰落。迄西元一八五七年，仍維持國祚於不墮，英軍入，乃投降。

蒙古的帖木兒從北方入印度時，明朝也從南方與印度交往。

西元一三六九年，洪武二年，派吳用、顏宗魯使爪哇。同一年，派劉叔勉使西洋瑣里(Coila)，這就是南印度的東岸國家。明史卷三二五外國傳西洋瑣里條云：「洪武二年，命使臣劉叔勉以即位詔諭其國。三年，平定沙漠，復遣使臣領詔，其王別里提遣使奉全葉表，從叔勉，獻方物，賜文綺紗羅諸物甚厚，並賜大統曆。」

西元一四〇三年，據明史卷三二五外國傳西洋瑣里條云：「永樂元年，命副使聞良輔，行人寧善使其國，賜絨錦文綺紗羅。已復命中官馬彬往使，賜如前。其王即遣使來貢。附載胡椒與民市，有司徵稅，命勿徵。」

西元一四〇五年，據隨同鄭和出使的馬觀所撰瀛涯勝覽，古里國條有云：「永樂五年，朝廷命正使太監鄭和等齎詔勅賜其國王誥命銀印給賜，陞賞各頭目品級冠帶，統領大駝寶船到彼，起建碑庭，立石云：「其國去中國十萬餘里，民物

威著，熙暉同風，刻石於茲，永示萬世。」

西元一四〇七年，鄭和所撰碑記文中云：「永樂五年，統領舟師，往爪哇、古里、柯枝、暹羅等國。王各以瓊寶、珊瑚、異獸貢獻。」至於鄭和所到各國，在明成祖實錄中云：「賜其國王，錦綺紗羅。」以重交誼。西元一四〇九年二月十五日（永樂七年二月初一日），鄭和曾在錫蘭山等，大事佈施，並立碑記述經過，據隨同鄭和航行之費信所撰星槎勝覽錫蘭山條云：「永樂七年，皇上命正使太監鄭和等齎詔勅，金銀供器，彩粧織金寶幡，布施於寺，乃建石碑，以崇皇圖之治。」南印度的小國小葛蘭國（*Qulion*）曾遣使來貢，據明史卷三二六外國傳小葛蘭條云：「其國與柯枝接壤，南北地窄，西洋小國也。永樂五年（西元一四〇七年），遣使附古里、蘇門答臘入貢，賜其王錦綺紗羅鞍馬諸物，其使者亦有賜。」

一四〇九年（永樂七年），鄭和秋天奉命出使，到一四一一年（永樂九年）回國，這次所到達的許多國家中，在南印度的，仍有古里和柯枝。據明史卷六成祖本記所記，永樂七年，古里入貢。永樂九年，古里和柯枝又來貢。

西元一四一二年十二月十八日（永樂十年十一月十五日），鄭和奉命出使，於一四一三年（永樂十一年）啓程。到西元一四一五年八月十二日（永樂十三年七月初八日）回還復命。這次所到的國家中，在南印度的，仍有古里和柯枝。並賜諸國錦綺、紗羅、彩綢等物有差。據明史卷七成祖本紀所記：永樂十三年（西元一四一五年），

古里、柯枝和甘巴里來朝貢。十四年（西元一四一六年），古里、柯枝又來朝貢。

西元一四一六年十二月廿八日（永樂十四年十二月初十日），鄭和奉命出使，於西元一四一七年（永樂十五年）啓程。到西元一四一九年八月八日（永樂十七年七月廿七日）回京復命。這次是因為南洋和印度洋一帶的十八國使臣辭還，其中有古里和柯枝二國的使臣。據明成祖實錄所記：「悉賜文綺襲衣，遣中官鄭和等，齎勅及錦綺、紗羅、綾絹等物偕往，賜各國王。」在西元一四一七年（永樂十五年），南印度的國家中，西洋瑣里來朝，到西元一四一九年（永樂十七年），古里偕同滿刺加十七國又來朝貢。

西元一四二一年三月一日（永樂十九年正月三十日），鄭和奉命出使，月餘後啓程。這次又因為有南洋十六國使臣還國，據明成祖實錄所記：「賜紗幣表裏，遣太監鄭和等，齎勅及錦綺、紗羅、綾絹等物賜諸國王。」西元一四二二年九月三日（永樂二十年八月十八日）回京復命。因為南印度的甘巴里第二次來貢。所以鄭和在這次航行中，於西元一四二二年（永樂十九年），曾經到達甘巴里，當然有一番封賞。據明史卷七成祖本紀所記，同一年，古里和柯枝遣使入貢。西元一四二三年（永樂二十一年），古里和柯枝，又來入貢。

西元一四三〇年六月二十九日（明宣宗宣德五年六月初九日）鄭和奉命出使。西元一四三二年一月十二日（六年十二月初九日）啓程，到西元一四三三年七月廿二日（宣德八年七月初六日

），回京復命。這一次航行，因有祝允明所撰的見聞記，記述所到各地及時間，比歷次都要詳確。於西元一四三三年三月三十一日（宣德八年三月十一日），到古里，四月九日（三月二十日）回洋。據馬歡所撰瀛涯勝覽天方（*Mecca*）條所記，船隊航行到古里時，遇見天方國差人，就選派通事七人，帶了麝香、磁器、搭乘天方國船隻，到天方國。採辦奇貨異寶，往還一年。可見當時的古里國，也是東西航路中的重要商站。從古里出發的航線，應該分為二條，一是向西北到波斯灣口的忽魯謨斯（*Horamuz*），二是向西到阿刺伯半島南岸的祖法兒（*Djoffor*）、阿丹（*A-Tan*）。所以鄭和的七次航行，都要到達或經過古里國的。不過在鄭和以後，中國人遠航到南印度的機會，就很少了。

以上是中、印兩國在歷史上交往的大概。現在，我們來談一談中、印兩國的貿易與瓷器、絲織品輸入印度的狀況。

二、中印兩國歷史上的貿易與考證

中國古代素無重商政策，對外貿易，全靠人民自由貿易。加以文獻不足，難以考徵。只有據歷史上各時代之產品特徵，加以考察。

古代各國貿易，必由接觸而起，接觸的方式，有外交、有戰爭、有文化交流。

漢武帝時，中國對南印度黃支國，是「市明珠、璧流離、奇石、異物、黃金、雜綸。」繪乃帛之總名。瓷器、即是此時傳入。印度稱中國為支那，雖譽為智慧之意，亦與瓷器有關。漢代中

國字中始有「瓷」字。史記云：蜀人以邛竹杖蜀布，之於身毒。可知漢代之人已至印度貿易。

唐玄奘赴印度，採由陸路。中國與北印度隔西馬拉雅山，交通不便。玄奘繞道新疆經北天竺而往，艱苦備嘗，自無貿易可言。但中國絲織品、銀器仍可由新疆到波斯，漢代波斯人，掌中國貨物輸往羅馬之權，回教國在印度德里建立時，中國絲織品、銀器等，經由波斯人隨回教入印度，乃是可能之事。

宋代的瓷器，以青瓷著名，已銷到南洋，土耳其、印度、歐洲。

帖木耳蒙古大軍入印度，一如蒙古大軍入歐洲，商業貨物自隨之而往。忽必烈時，綠、淺藍、黃褐等各色綾、緞，紛紛銷西方，自也會銷入印度。元時詔書均用刺繡，蓋防損毀。其詔西蕃，以粉書詔文，於青繪繡，以白絨網以珍珠，至御寶處，則用珊瑚，遣使齎至彼國。

明代，對印度使者嘗賜文綺、紗羅、絨錦、頒品級冠帶，給賜銀印、錦綺、鞍馬。又以金銀供器、彩粧織錦寶帳，布施於寺。或賜文綺襲衣、綾絹。或由中國使臣帶麝香、磁器而往。

西京雜記：漢宣帝以威里織成，絨身毒寶鏡。身毒即古印度名。漢代輸入中國者已有寶鏡。明成祖時，印度使官曾附載胡椒與民市，有司要徵稅，成祖命勿徵。

以上是就中國官書所載，兩國互換之器物。這也可說是官方交易，民間商人，必也可將此類貨品轉輸互市。

從地下考古學的遺址發掘，關於中、印貿易

，已有許多證明。

西元二世紀的貴霜王朝離宮的遺址，在阿富汗首都喀布爾之北發現，其中有中國漢代的漆器。在巴基斯坦的塔克西拉發現的貴霜王朝遺址中，有中國漢代的玉製刀裝具。

中國十一至十三世紀的宋代龍泉窯的青瓷，是很著名的瓷器，迄今世界上的任何國家，皆無法仿製。在阿富汗的巴米安 (Bamiyan) 盆地

斜里戈爾戈拉 (Shari-Gorhara) 地方，已發現有青瓷的小小斷片。在斜里周哈克 (Shari-Zohak) 地方，也發現中國的陶器。

十四、十五世紀的明代初期的青瓷大盤，曾陳列在阿富汗首都喀布爾的店中出售，為附近寺廟及富家所寄售。

西元九世紀，中國晚唐越州窯磁的水注，在八世紀初的伊斯蘭治下今日巴基斯坦海港迭巴爾 (Debar) 區域的班波爾 (Bandhore) 發現。唐代的越窯，以產青瓷著名。

同時在班波爾發現有中國長沙窯的瓷器，在黃褐色的釉瓷上，用綠色畫着花樣的大碗的破片，乃與一般中國的陶瓷的色調和設計，有所不同。或者就是專為了輸出。這種瓷器，在印尼、遼遠的埃及和伊朗也有發現。證明了九世紀時陶瓷所行的道路，是由巴基斯坦的班波爾連繫在印尼與伊朗之間。

在巴基斯坦班波爾發掘出來的，十至十三世紀宋代的陶瓷，數量與種類甚多。其中有線條花樣的宋代初期越州窯破片，浮出美麗蓮瓣的華南白瓷片，宋末元初的浙江龍泉窯青瓷片，廣東方面

製造的鉛釉四耳壺破片。

中東一帶也有類此的發現。紅海岸愛布扎遺跡中，也有中國廣東的鉛釉瓷片。

班波爾接近印度河口，東亞商品運抵此地，溯印度河運往腹地。或逕運往阿拉伯海各沿岸地方。

溯印度河而上，至新德省那瓦普夏縣 (Nawabshah) 布拉米拉巴德城 (Brahminabad) 會發現九至十世紀的唐末、五代起，至十一世紀宋初的中國青瓷、白瓷、和褐釉陶瓷之破片。印度河上游的旁遮普地方，發掘有十五世紀前後明代白瓷青花小片。

巴基斯坦西部俾洛支地方，面臨阿刺伯海的馬克蘭省，科魯瓦區 (Kolwa) 之帕克 (Pak) 遺址，有中國陶瓷片。馬克蘭省其他數處，也發現了十世紀的青白瓷。可見中國瓷器在印度貿易地區分佈之廣。

從印度今日德里市面手工藝品製造而言，其象牙雕刻、珠寶、金銀鑲、刺繡、絲圍巾、青銅器、紅銅器、陶器，以至木雕等，都甚精巧。可說是中、印兩國在古代交易的結晶。其中絲織品則是中國傳入的技術。

據印度河下游的西岸 Harapa 地方，發現西元前三千年的遺址，內有赤土陶器、骰子與棋子、硬幣、金銀手鐲、耳環製品、頂圈、珠寶、雕刻有象形文字的印章、石頭雕刻品、彩色瓷器等。就象形文字印章而言，與中國皇帝用龍面璽有關。就瓷器言，當然來自中國。所以，中印兩